

第8典 艺文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2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第6典 学术

第7典 科学技术

中华文化
通志

第1典

【历代文化沿革】

清代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祖武
汪学群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1

典

【历代文化沿革】

清代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清代文化志

作者简介

陈祖武,1943年生。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等。

汪学群,1956年生。1988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著有《钱穆评传》(合著)、《清前期文化史》等。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恰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在中国文化史上,清代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系统总结和整理,也是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一步。有清一代的两个多世纪间,数千年古老文明的深厚积累,一代经济、政治的盛衰起伏,中外交往的由隔绝而趋于频繁,为此一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交融,中西文化急剧碰撞而趋于会通,演为古国文明的再度辉煌并迈入近代文化的门槛。《清代文化志》以学术文化为主,兼及观念形态的其他领域,博采众长,勾勒梳理,从而再现一代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清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3
第一节 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3
第二节 康乾盛世的兴衰	7
第三节 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	18
第二章 满汉文化的冲突和交融	29
第一节 八旗制度与满文化的崛起	29
第二节 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	42
第三节 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满汉文化的合流	52
第三章 清初的学术文化	67
第一节 清初的主要思想家及其成就	67
第二节 清初史学	80
第三节 清初文学艺术的经世特征	94
第四节 理学与考据学风的酝酿	105
第五节 清初学术的历史地位	121

第四章 《四库全书》的编纂	134
第一节 编纂缘起.....	134
第二节 成书与庋藏.....	141
第三节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总目》.....	145
第四节 禁毁图书与文字冤狱.....	150
第五节 《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161
第五章 乾嘉学派与清中后期学术	164
第一节 乾嘉学派.....	164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思想家.....	180
第三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205
第四节 阮元与《皇清经解》.....	217
第五节 晚清学术.....	230
第六章 新旧杂陈的清代中后期文化	247
第一节 清中叶的文学艺术.....	247
第二节 晚清的文学艺术.....	262
第三节 新闻与出版.....	275
第四节 宗教与结社.....	283
第五节 从科举取士到新式学堂.....	294
第七章 晚清七十年的思想潮流	307
第一节 经世思潮的崛起.....	307
第二节 太平天国思想.....	320
第三节 洋务思潮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	331
第四节 变法维新思潮.....	344

第五节 民主革命思潮.....	361
参考文献.....	377

导 言

中国文化既是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地域文化范畴,又是不断发展和充实的历史文化范畴。今天的中国文化,正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也必将在此基础之上,带着时代赋予的新内容而延伸。因此,始终有一个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既往文化传统的问题。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行帝制的最后一个朝代。按照习惯的历史分期,清代的二百六十余年,跨越了中国社会形态的两个时代。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之前属于中国古代社会,之后则已迈入中国近代社会的门槛。当然,社会的发展并不会如此整齐划一,这无非只是一个大致的历史标志而已。由于清代社会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以之为舞台的清代文化,也显示出它独特的历史个性。清代文化的独特历史个性,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中国古代实行帝制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的久远积累,社会的蹒跚演进,赋予清代文化以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特征。因而它博大恢弘,气象万千。古人吟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清代文化亦然。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审视它,皆可领略其间的历史魅力。其次,清廷以满洲贵族为主体,是一个满汉合流的政权。反映在一代文化上,则是满汉文化从剧烈冲突到认同而融

合。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必然延伸,清代文化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属性,同时又有它不同于先前的汉唐文化,乃至辽、金、元文化的历史个性。它是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干的满汉合流文化形态。再次,自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起,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剧变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经济在变,政治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有力的挑战,古老的中国文化开始了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端,清代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先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将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梳理,从而反映一代文化演进的规律,本质地再现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文化问题,迄今尚无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能力的综合表现,文化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把文化界定在观念形态之内。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又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②这是一段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经典表述,它的正确性业已为实践所检验。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离开这么一个基本认识。

根据上述认识,以下,拟以清代观念形态文化的论述为重点,兼及一代物质、制度诸层面的文化形态,以期准确地、完整地、系统地反映二百六十余年间文化的沿革。只是囿于学力,孤陋寡闻,所做梳理未必允当,疏失纰缪在所不少。因此,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② 同上书,第664页。

第一章 清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

清代文化,上承明代文化遗绪,以清代社会为其广阔的活动舞台,在 1644 年至 1911 年的二百六十余年,发生、发展、演变,进而向中国近现代文化过渡。梳理一代文化沿革,弄清楚其间的演进规律,首先必须对为其提供活动舞台的历史环境进行考察。这是探讨历史问题的一个基本准则。因此,以下拟对清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做一个鸟瞰式的勾勒。

第一节 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亡清兴,王朝更迭,形成中国古史中又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启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痼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明史·食货志》)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四十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黑暗腐朽,无以复加。崇祯帝当政十七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颓局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这样一个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间,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辽东、辽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忧患。而置朱明王朝于

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四十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荡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形同敌国。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在明末农民大起义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历史的现